

辛亥革命论文集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下册)

历史系
武汉师范学院科研生产处编
学报编辑会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九月

53

评辛亥革命时期 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

徐 善 广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民主共和的国家政体，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期，曾出现过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这种思想，而主要在国内活动的，其影响又是很大的，要算刘师复。刘师复颇受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崇敬和“倾服”。他的门徒称刘师复为“模范革命实行家”和“导师”，对刘师复“五体投地”，赞刘师复“支手回天”①。

刘师复（一八八四——一九一五），原名刘思复，一九一二年七月，废姓，易名师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十五岁时考中秀才。一九〇一年在石歧城创立演说社，提倡改革。一九〇四年赴日本留学。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刘师复加入同盟会，并曾参与同盟会的组织工作。在日本，他还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和俄国“虚无党”的影响。一九〇六年，刘师复回国，在香山创办隽德女子学堂，

编辑《东方报》。一九〇七年春，为配合许雪湫、邓子瑜

359

A 850353

在潮州、惠州两地发动的起义，同盟会会议暗杀粤督岑春煊和把守珠江口的水师提督李准。由于刘师复在日本横滨曾学习过制造炸弹，因此派他到广州组织秘密机关，执行暗杀李准的任务。事败，刘师复被捕，同年九月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到一九〇九年夏，经陈景华、郑彼岸等营救出狱，赴香港。在香港，刘师复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与谢英伯、朱述堂、陈自觉、高剑父等聚议，谋组织暗杀团，并定名为“支那暗杀团”，继续进行无政府暗杀活动②。在此期间（包括从一九〇七年九月到一九〇九年夏两年多的监禁期间），刘师复通过研读在巴黎由李石曾（李煜瀛）、吴稚晖（吴敬恒）等人编辑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纪》，开始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自认为“反抗强权之革命党，而非复政治之革命党。”③据文定所写的《师复先生传》中说：“所谓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在“狱中经过种种刺激及研究以后，在此时已发生了”④。由于刘师复在日本留学时就向往无政府主义，在监禁和在香港期间又阅读了《新世纪》等无政府主义书刊，于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逐步坚定，从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最有影响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夕，刘师复拟去北京，刺杀清政府摄政王载沣，等他到上海后，武昌起义已经爆发。此时，刘师复认为“无政府主义从此已有传播的机会。”⑤因此，他回到广州，于一九一二年五月刘师复、彼岸、佩刚、扈离、天放、抱蜀、无为等人在广州西关存善东街八号，发起组织“晦鸣学舍”⑥。是为中国内地传播无政府主义之第一团体，数年前《新世纪》所下之种子，至是乃由晦鸣学舍为之灌溉而培植之。”⑦“晦鸣学舍”成立后，以刘师复为

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首先大量翻印在巴黎出版的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并先后辑印了《新世纪丛书》和《无政府主义粹言》，又将此二书中的主要内容辑印为《无政府主义名著丛刊》。此外，尚有《军人之宝筏》与《晦鸣录》第一期。他们把这些书刊、印刷品向内地广为散发，无代价地邮赠给国内各报馆、会社、省议会、县议会。因此，无政府主义逐渐为国人所知。在大量印发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的同时，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廿八日，又创办了“晦鸣学舍”的机关刊物《晦鸣录》（后改为《民声》周刊），成为在中国内地鼓吹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阵地。刘师复担任《晦鸣录》的主编，其成员有区声白、黄凌霜、郑彼岸、许论博、梁冰弦和林君复等。该刊不仅在国内发行，而且在香港、南洋群岛流传。刘师复在《晦鸣录》发刊词中，标榜“实行世界革命，破除现代社会一切强权”，提出了八条纲要，即：“共产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工团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万国大同。”⑧从这些小册子所宣传的内容来看，几乎包括了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流派即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还有一些有关法律与强权的论文等。但从刘师复本人在这个时期的著作，特别是论述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来看，他所拥护、信仰和宣传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正如刘师复自己所说，他是一个“完全服膺克氏（注：即克鲁泡特金）学说者。”⑨“吾人欲表揭一正确之定名以号召天下，莫若名之曰：‘无政府共产主义’（简称则曰无政府主义）。从事此主义者曰：无政府共产党”（简称则曰无政府党）⑩。

一九一二年，刘师复约集郑彼岸、莫纪彭、林直勉等人，于广州东园组织了“心社”⑪，作为联结无政府主义者的

核心团体。该社没有章程、规则，不收社费，也不设社长和干事。其宗旨是：“破除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替之。”另订有社约十二条，作为践行的标准，即“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乘轿及人力车；五不用仆役；六不婚姻；七不称族姓；八不作官吏；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凡能履行这十二条社约的，即为社友，其遵守与否，各问“良心”，并无“罚条”^⑫。“心社”的这十二条社约，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同盟会中无政府主义信仰者所倡导的“六不会”（即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吃鸦片、不纳妾）的脱离政治、放弃夺权斗争等消极情绪的进一步发展。其危害是：“把革命的中坚、纯洁的青年引到脱离政治的地步，不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总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⑬一九一三年七、八月间，篡窃辛亥革命成果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后，在全国实行专制独裁和高压政策。袁世凯派到广州的龙济光查禁了《民声》周刊和查封了“晦鸣学舍”。“心社”亦被“立饬解散”。于是，同年九月，刘师复到澳门，继续出版《民声》周刊。不久，袁世凯令外交部照会葡萄牙公使，禁止无政府主义者在澳门活动，因此，《民声》周刊在澳门仅出了两期，又被迫停刊。

一九一四年一、二月间，刘师复等在上海发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同年，《民声》也在上海复刊。一九一四年七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成立于上海，并发表了宣言。在成立宣言中，首先说明了什么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主张，并要求各地无政府主义者，“当各在其所在地与宗旨

相同者联络为一，相其情势，创设自由集合之团体（或秘密之组织或为表面研究学术之机关）。以为传播主义联络同志之机关，以为将来组织联合会之预备。”在联合会尚未成立之前，则以“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为“暂时之交通机关”，希望各地无政府主义者“无论为个人，为团体，均望随时与本社互通声气。”使他们彼此之间“精神上皆联为一体，实际上皆一致进行。”^⑭在这个组织的影响下，广州的刘石心等成立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江苏常熟的蒋爱真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社”，南京的杨志道等成立了“无政府主义讨论会”。他们间互通声气，互相声援。甚至在新加坡、加拿大等地都有他们的活动。

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致力于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组织活动，引起了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注意，如克鲁泡特金、格拉佛、高德曼、大杉荣等也纷纷来信表示支持。一九一四年八月至九月世界无政府党万国大会在伦敦开会，刘师复代表中国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致书无政府党万国大会，报告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和目前的情况，并向大会提议：（1）组织万国机关；（2）注意东亚的传播；（3）与工团党联络；（4）万国总罢工；（5）采用世界语^⑮。这说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已与国际上无政府主义者开始联系起来了。

在此期间，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注意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活动，力图影响工人运动。刘师复等所刊行的《工人宝鉴》，就是专门对工人进行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刊物。一九一四年八月，上海发生漆业工人罢工，刘师复特为此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写了一篇《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向中国工人进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宣传。他强调工会组织的“宗

旨”，“当以革命的工团主义为骨髓，而不可含丝毫之政治意味”，“在保护工人道德上经济上各种权利”，总之，“不恃政治而维恃自己实力以灭除贫富阶级。”企图使工人运动脱离当时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他还指责工人阶级觉悟低，“而未尝有所进步。”刘师复认为工人运动的方针“不外六字”，即“结团体，求智识。”^⑯此外，刘师复等还在广州组织了“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他们在工人中极力鼓吹工团主义。据邓中夏同志记载：“无政府党——首领刘师复，在中国南部宣传无政府主义，发行刊物多种。……他在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无政府党对于工人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无政府党在南方工会中有很大影响。”^⑰

一九一五年三月廿七日刘师复因肺病死于上海。刘师复虽然死了，但他所进行的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组织活动，他所传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辛亥革命时期和以后的历史发展是有其影响的。

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是拥护、信仰、传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他的理论、纲领和主张很多都是从克鲁泡特金那里抄来的。

刘师复提出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制定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纲领。他在《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一开头就说：“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何？主张灭除资本主义制度，改造共产社会，且不用政治统治者也。质言之，即求经济上及政治上之绝对自由也。”“‘无政府’以反对强权为要义，故现社会凡含有强权性质之恶制度，吾党一切排斥之扫除之，本自由平等博爱之真精神，以达于吾人所理想之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

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所，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之社会。”他们要把“一切生产要件如田地、矿山、工厂、耕具、机器等等”，“归之社会公有”；把“劳动所得之结果如食物、衣服、房屋，以及一切用品，均为社会公物”，主张这些社会公有物“人人皆得自由取用之”，“劳动者自由取用之，而无所限制。”¹⁸这就是他们所幻想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亦即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同克鲁泡特金所理想的“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怎样实现他们的理想即最终目的呢？刘师复认为“欲达此种目的，当用以下之手段”：

(一) “用报章书册演说学校等等，传播吾人主义于一般平民。”刘师复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认为“劳动为人生之天职，互助为本来之良德”，“劳动”和“互助”“二者皆是人类之本能”，只要通过教育感化，就能使人们“晓然与吾人主义之光明”，“使家喻户晓之”，相信无政府主义了。(二) 经过“文字口舌，奔走鼓吹”无政府主义，继而煽起“众人起事”的风潮，“遍传遐迩”。刘师复认为不要任何组织领导的“平民大革命”一哄而起，实行“暗杀罢工暴动”，就可立即消灭国家政府，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就建立起来了。他认为当前则“致力于传播”无政府主义¹⁹。

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刘师复提出的这种貌似革命的纲领和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和对封建军阀的痛恨，以及他们企图摆脱现状寻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未来社会的愿望。但是，这种纲领和主张，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直到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里，曾不屈不挠地对外国侵略者和

国内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意义深远的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制定的革命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毛泽东同志指出：“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⑯这个革命的纲领，在与改良派的斗争中，在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提出了必须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个革命的主张，在当时不仅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且还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拥护。历史证明，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辛亥革命失败了，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制定的纲领和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反映，也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愿望的集中体现。辛亥革命虽已失败，但革命尚未成功，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仍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正如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日、英、美等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袁世凯等军阀相结合，加深了中国民族的危机，促使中国的社会更加黑暗腐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列主义未传入中国以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尚未爆发的国际条件下，中国的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这个革命还必须在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制定的纲领和主张的指引下继续进行。而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观点和极端的

个人主义出发，打着“无政府革命”的旗帜，抄袭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词句，兜售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最彻底革命”的恣态，抛出了一个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的革命的纲领和主张相对立的纲领和主张。它不仅不能解决当时中国革命的任何问题，而只能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着腐蚀、瓦解和干扰破坏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所提出的纲领和主张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反动。

以刘师复为代表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是反对国家政权，主张全部废除国家。对于作为国家机器主要成分的军队和法律，也都一概加以反对。刘师复对政府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首先，对于什么是政府这一问题，刘师复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政府果为何等之物乎？”“政府者剥夺自由扰乱和平之毒物也。”其次，政府是怎样产生的呢？刘师复说：“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²¹第三、刘师复主张反对任何性质的政府，他认为：“政府为万恶之源”，“凡有政府之世，人民必无真自由。”“自有政府”，“而自由全失”，“而和平全失。”²²为什么呢？他说：“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强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又说：“世界之人类，皆兄弟也，吾人本能互相亲爱，政府乃倡为爱国之论，教练行凶杀人之军队，以侵凌人国为义务，于是宇宙之同胞，互为仇敌，而和平全失。”²³因此，刘师复主张废除军队，废除法律，废除“强权”、“万恶”的政府。他认为：“政府一去，百事皆了”，“一变而为协爱。”²⁴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当时，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目标，而且是当时起义各省共同对清王朝进行斗争的迫切要求。刘师复根本不了解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不区分国家的性质，不去考查国家政权的阶级实质和历史作用，抽象地把一切政府统统都看成是“皆属万恶”和罪恶的“渊薮”，把一切军队和法律都认为是“行凶杀人”和“网罗陷阱”的“毒物”。刘师复的这种“无政府革命”的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对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极为有害的。事实正是这样。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这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保卫民主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武装斗争。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对待“二次革命”，不仅态度消极，认为两方面的是非胜败，均无“评论之价值”。他“于是屹然不动，专心一意地传播无政府主义。”²⁵而且，他还极力反对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他认为“二次革命”是所谓以“政府倒政府，终无善果。”“二次革命”失败后，到一九一四年六月，辛亥革命时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临时约法》、国会等等，已被袁世凯全部破坏。一九一五年，孙中山发表了《讨袁檄文》，揭露和痛斥了袁世凯废除约法，解散国会，破坏共和，谋叛民国，复辟帝制的反动行径。同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在全国各地联络军队，组织暴动，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为反袁斗争而奋斗。在全国反袁斗争兴起的时候，而刘师复则根据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国家、法律的理

论，提出所谓“吾人意见，以为国会与法律皆在当废之列。”他还说什么：“凡有政府，皆属万恶。袁氏虽去，岂遂无类于袁氏者起而代之；即使继袁者决胜于袁，亦不过其恶之大小略有比较，如五十步与百步之说耳。”²⁶又说：“有政府一日，即有强权，有强权一日即不能有真幸福。苟言锄强权，则当易讨袁之帜，为讨政府，凡有政府吾皆讨之。”²⁷正当孙中山领导人民进行讨伐袁世凯的时候，刘师复竟把这种革命行动诬蔑为“以暴易暴”而加以反对²⁸，这实际上起了维护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的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的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同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一样，都是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们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主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法律，视“种种法令”为“网罗陷阱”，反对一切权威，反对集中领导，用以反对一切政府。他们认为：“若万恶之政府既去”，那就会达到“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生活平等，工作自由，争夺之社会，一变而为协爱”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自治”的“幸福”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显然，这些主张，除了空幻以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何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极力鼓吹的这一套，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客观上起着腐蚀思想、涣散斗志和瓦解组织的作用。

在经济上，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也提出了一个“废去钱币”的主张²⁹。他们认为，金钱是有“罪恶”的，也是“万恶之源。”刘师复还大声急呼：“罪恶哉金钱！幸福之蟊贼，犯罪之根苗，悉在于此。”³⁰他还认为，如果实现了“十三无”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就会使“金钱之竞争自

绝。”金钱废除后，就会使人民享有“真自由”、“真幸福”，“人类道德”就“必立时归于纯美。”^{③1}这真是荒谬的梦呓！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并不是产生罪恶的根源。蠹贼和犯罪的出现，完全是私有制度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要消灭这些东西，首先就要消灭私有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辛亥革命时期来说，就是要首先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货币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那是要消灭的。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复侈谈这一问题，提出什么“废去钱币”的主张，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除了干扰破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争以外，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在革命手段方面，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个人恐怖，单纯地提倡个人暗杀，藐视广大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诬蔑劳动群众是“愚民”，把革命的成功寄托在所谓个人“先觉者”的冒险行动上。刘师复还主张“对待皇帝总统资本家”要“以手枪炸弹相讐。”^{③2}从一九一〇年刘师复组织“支那暗杀团”一直到武昌起义以后，刘师复还在进行暗杀活动，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刘师复无政府主义者顽固坚持历史唯心主义的立场。采取个人暗杀手段进行革命，顶多只能“治标”，根本不能“治本”，决不会对革命带来胜利，反而会给革命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这一点，中外古今的历史事实已经反复证明。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受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在辛亥革命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条件下出现的。他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个人主

义是他的整个世界观的基础。他的理论、纲领和主张不仅很多都是抄自克鲁泡特金的，而且是空幻的，不切实际的，乃至是反动的。因此，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的一套，对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以后的历史发展是起着坏的影响的。这一点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同时应该看到，从二十世纪初国际上的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它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着较大的影响。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主要是由于旧中国是一个广大的个体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社会，使得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一度产生和传播。它在五四运动前，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从个人主义出发，在反对封建家族、封建婚姻、封建道德，揭露封建军阀政府的黑暗腐败，反对一切剥削压迫的社会制度等方面，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

列宁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他们“(a)不懂得剥削根源；(b)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c)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⑬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破坏性就日益暴露无遗。在这一时期，中国许多继刘师复而起的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都是他的门徒；他们所创办的刊物，只不过是重弹刘师复的老调而已。他们公开承认：“师复先生是我们的先觉，我们是师复先生的后觉”，“他的主义，就是我们的主义。”如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黄凌霜、区声白等，他们继承了刘师复的衣钵，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反对一切强权，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任何组织纪律；反对“各

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主张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攻击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敌人。

如果说，在开始，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矛头主要是对着封建主义的话，那么，到十月革命以后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为它猖狂进攻的主要方向了。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我们党的筹建工作的进行，为了肃清无政府主义对革命的严重危害，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经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这场斗争的胜利，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更加广泛深入的宣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随着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就逐渐烟消云散，最后终于在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销声匿迹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又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年，也是为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一年。在这样的时候，对辛亥革命时期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一番评论，不是没有益处的。刘师复的无政府主义这面陈年古镜，可以帮助我们深刻认识无政府主义的谬误和危害，从而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

注释

- ①④⑤⑯《师复先生传》（《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1—2页，第6页。）
- 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02页。
- ③《驳江亢虎》（《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226页。）
- ⑥《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政治思想》（《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17号。）
- ⑦⑮《致无政府党万国大会书》（《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259页，第263—265页。）
- ⑧《晦鸣录发刊词》（《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58页。）
- ⑨《答迦身》（《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167页。）
- ⑩《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15页。）
- ⑪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211页。
- ⑫《答凡夫书》（《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一九二七年八月初版，第143—144页。）
- ⑬吴玉章：《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
- ⑭《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师复文存》第56页。）
- ⑯《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师复文存》第81—84页）。

